·古籍整理·

《三字经》满、蒙文本及仿制本述论

肖朗1,王鸣2

(1. 浙江大学 教育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2. 浙江大学 日本语言文化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三字经》历来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幼学启蒙教材之一。清朝建立后,《三字经》满、蒙文本相继问世,对满、蒙民族居住地区教育的发展以及满、蒙民族的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鸦片战争前后出现了多种类型的《三字经》仿制本,其中既有外国来华传教士编撰的基督教《三字经》仿制本,又有太平天国刊印的通过宣传基督教来号召推翻清王朝的《三字经》仿制本,还有医学版等专题性质的《三字经》仿制本。此外,日本在江户时代及明治维新后也出现了多种版本的《三字经》仿制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三字经》不但是文化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而且是文化教育交流史上的重要文献。

[关键词]《三字经》;满、蒙文本;仿制本;文化教育交流

A Study on the Manchu and Mongolian Texts of

Three Character Canon and Their Imitations

Xiao Lang¹, Wang Ming²

- (1.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 2. Institute of Japanese Language &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Sanzijing (Three Character Canon) has long been acknowledged as one of the most wide-spread and influential children's primers. Under the educational policy of the Qing dynasty, Sanzijing came into being in both the Manchu language and the Mongolian language. Afterwards, bilingual texts became available in the Chinese-Manchu or Chinese-Mongolian format. Word-by-word and sentence-by-sentence annotations were made by following the annotated texts of Sanzijing in the past dynasties. As a result, it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areas inhabited by Manchu and Mongolian ethnic groups and to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and the Han nationality.

Around the period of Opium War, with the trend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arrival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came out the Sanzijing which focused on the spread of

[收稿日期] 2007 - 03 - 12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500 - 81123)

[作者简介] 1. 肖朗,男,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和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史研究; 2. 王鸣,女,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日本语言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日本语言与社会文化研究。 Christian doctrine. The main editions include the one compiled by W. H. Medhurst, an English missionary, and the two by American missionaries C. Hartwell and H. Blodget. These Christian imitations were adapted from the basic content of the Bible and in the similar format of the original *Sanzijing*. In this sense, they are a special kind of preaching books.

Different to some degrees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imitations are another two editions of Sanzijing in imitation, compiled by Sophia Martin, an English missionary and printed by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respectively. The former edition intended for female students taught them to believe in God and to do good in line with the secular ethic and morality. It was of great practical value in that it was concerned with many daily aspects of women 's life, including many commonly-used Chinese characters. The latter edition, which introduced and preached Christian doctrine, was an attempt to elaborate on the uniqueness of God and universality of Christianity by incorporating some Chinese historical knowledge. Moreover, it advocated Chinese peasants' rebellion to overthrow the Qing dynasty. In this case, it produced a revolutionary influence when it was adopted as the textbook for the kingdom schools to educate the peasants' childre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hen Sanzijing found its way well into the academic field, imitations of Sanzijing on several specialized topics emerged, notably the medical edition, which drew wide attention. The two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ed Sanzijing on Medicine by Chen Nianzu, a noted Qing doctor and Sanzijing on Ophthalmology by Hu Yinchen, a medical scholar in the Qing. These two medical Sanzijing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specialized knowledge with the imitated form of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 Sanzijing.

On the other hand, Sanzijing in Chinese was introduced into Korea, Japan, Vietnam and some ot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Edo period and Meiji Restoration in particular witnessed the appearance of many imitations of Sanzijing, which exerted some wide influence on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refore, Sanzijing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not only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but also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s.

Key words: Sanzijing (Three Character Canon); Manchu and Mongolian texts; imitatio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s

相传为宋代王应麟编撰的《三字经》继《百家姓》、《千字文》等古代蒙学读物之后,以其丰富的知识内容、朗朗上口的韵语形式,历元、明、清三代而不衰,成为一部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幼学启蒙教材。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均出版了多种《三字经》校刊本、注解本以及现代汉语翻译本,有关中国教育史、幼儿教育史的论著中也都提到《三字经》,但均未涉及《三字经》的满、蒙文本及各种仿制本;至于《三字经》传入国外的情况大都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例如,《三字经辑刊》一书虽提及《三字经》曾传入日本,但仅说了一句"很早就传入东邻日本"[1]4,而对传入的具

主要有梦觉居士编著《三字经注解》,(台南)立文出版社 1983 年版;邓妙香编著《三字经》,(台南)世一书局 1986 年版;齐令辰著《三字经简注》,(北京)宝文堂书店 1988 年版;吴蒙标点《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详解三字经》,(香港)风华出版社 1990 年版;黄沛荣编译《新译三字经》,(台北)三民书局 1992 年版;陆林辑校《三字经辑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喻岳衡主编《三字经》,(长沙)岳麓书社 1997 年版;以及范又琪编著、朱聚一绘画《三字经图文通解》,(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等。

体情况及影响等问题,则未展开论述。本文主要利用笔者出国访学期间收集到的若干重要资料,特 别是通过在日本东洋文库、东京大学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查获的几种比较珍贵的文本, 就《三字经》满、蒙文本和各种仿制本作一初步的整理考察 .以期揭示《三字经》在汉民族与少数民族 文化教育交流以及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所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三字经》满、蒙文本

清朝建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通过了一系列措施以强化对民众思想、文化及教育的管理和控 制。早在顺治九年(1652),顺治帝就将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的"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邻里,教训 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圣谕六言'颁行八旗及各省,作为清政府的文教方针和指导思想加以 推行。康熙九年(1670),康熙帝以此为蓝本形成"圣谕十六条",分别从宗族、农桑、学校、法律、租 税、保甲等方面加以条理化、系统化。在此基础上,雍正帝于1724年正式颁布《圣谕广训》,对清代 文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教授读写基础知识和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 的《三字经》,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清代的学塾及民间广为使用和流传。另一方面,清朝作为一个 多民族的国家,如何使满、蒙等少数民族尽快接受中国传统教育,顺利融入汉民族的主流文化,已成 为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于是,将当时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蒙学教材《三字 经》译成满、蒙等文本也就实属必要了。据现有资料,清代中期出现的满、蒙文本《三字经》主要有: (1)《满汉合璧三字经注解》,满洲教习陶格翻译,中书教习傅尔汉参订,满洲教习盛冠实校阅,京都 (北京)二槐堂梓行,乾隆六十年(1795);(2)《满蒙合璧三字经注解》,崧巌富俊辑,英俊绿、乌尔棍扎 布校正,福谦详校,京都隆福寺胡同三槐堂书坊板藏,道光十二年(1832)。

《满汉合璧三字经注解》汉、满两种文字对照,左侧汉文,右侧满文,将汉语《三字经》逐字逐句译 为满文。正文之前刊有"翻译主事馨泰"所写的序文:"三字经者,上自天时之五行四序,下及人事之 三纲五常,以至历朝之统绪,经史之源流,与夫蒙养之方,上达之序,嘉言善行之可循,而可法者,罔 不备载。其言简,其义该,其词近,其旨远,诚幼学之不可不读也。但旧有注释,未经翻译,则满汉未 能通行,所谓童而习之白首而不知其说者,亦有之矣。陶公(指陶格 ——笔者注)训课之暇,将是书 细心翻译,义类疏通,辞旨明达,使读者开卷了然,虽三尺童子无不心领神会。其嘉惠后学之功,一 如菽粟布帛之甚切于人,爰付剞劂,以永其传。余特为之序。"[2]

上述序文首先充分肯定了《三字经》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而这正是它作为蒙学教材的主要特色 之一,对清朝各民族的幼儿教育及民众教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继而说明由于历来满汉两种语言 文字的隔阂。致使《三字经》未能在满族儿童和民众中得以传播:最后称赞陶格以满汉两种文字对照 的《三字经》译本"义类疏通,辞旨明达",将对满族儿童的教育和民众的教化发挥很大的作用。由于 《三字经》并非一部仅供识字用的蒙学教材,它主要是一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读物,贯穿其中的主 要是中国古代历史知识和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这成为历代对之加以重视和推广的重要原因,显然也 是《满汉合璧三字经注解》译者关注的中心所在:加之《三字经》在语言文字等形式方面所具有的特 点,即上述序文中所说的"其言简,其意该,其词近,其旨远",因而为了揭示其深刻的含义,以达到在 满族儿童和民众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就有必要对《三字经》加以注解。有鉴于此,陶格在用 满文翻译了《三字经》正文之后,又参照历代《三字经》的注释本,同样以汉、满两种文字对照的形式 对《三字经》正文逐字逐句加以注解:在此过程中,陶格不断引用孔子、孟子以及朱熹等人的话来解 释《三字经》的" 微言大义 ",即主要说明《三字经》所包含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例如陶格在正文" 人

之初,性本善,"之后解释道:"此立教之初,发端之始,故本于人之初生而言之。天之所生,谓之人;天 之所赋,谓之性:秉彝之良,谓之善。人生之初,始有知则先识其母,始学语则先呼其亲。孟子曰:孩 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朱子曰:人性皆善,不其然乎。"21 他在正文 "性相近,习相远"之后又解释道:"此承上文而言。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言人初生之时,智 愚贤不肖皆同此性,本相近而无别也,及乎知识既开,气禀各异。"[2]2可见,这里主要解释了儒家伦 理道德观的思想基础"性善论"。

继《满汉合璧三字经注解》之后,道光十二年(1832)又刊印了《满蒙合璧三字经注解》。据崧巌富 俊所写的序文:"因思《三字经》为蒙童必读之书,于公余之暇,日偕二三友人,取陶公(指陶格 ——笔者 注) 之满洲文翻译蒙古文,斟酌研究,逾二三寒暑,方始成编。虽不敢遽谓大成之书,要于初学之士 不无小补云尔。用付剞劂,以公同志,其有未精纯者,尚望高明正之。"[3]《满蒙合璧三字经注解》不 仅在内容上以《满汉合璧三字经注解》为其翻译的底本,而且在形式上也仿照后者,即采用汉、蒙两 种文字对照的形式将《三字经》译为蒙文,并附有汉、蒙两种文字的注解。

明代教育家吕坤指出:"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 《千字文》,亦有义理。"4]449 受明代的影响,从清代中期开始,随着社学、义学及各类学塾的发展、《三 字经》等蒙学教材及读物广为流传和普遍使用。在各民族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的推动下.当时出现 了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字对照的语言工具书及各类读物。例如,清代官修的第一部满文分类字典《清 文鉴》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编成:至乾隆末年经过多次重修《清文鉴》又形成满、汉两种文字的对 照本:之后又有满、蒙、汉三种文字的对照本.如乾降三十二年(1767)傅恒等编《钦定增订清文鉴》、 乾降四十四年(1779)阿桂等编《钦定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相继问世:最后在此基础上.增 加其他文字的释文汇编成包含满、汉、蒙、藏、维吾尔五种文字的《五体清文鉴》[5]796。与此历史背景 相应,上述《满汉合嬖三字经注解》及《满蒙合嬖三字经注解》的编撰,对满、蒙民族居住地区教育的 发展,以及满、蒙民族的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交流,应该说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基督教《三字经》仿制本

19世纪初,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 Morrison)为首的西方传教士开始渡海来华:鸦片战争后, 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西方传教士大批来华,他们试图通过传播上帝"福音"的方式,达到 征服中国人人心的目的。然而,面对中国古老悠久的文明,他们也认识到如果不充分利用其优秀的 文化教育遗产,寻求某些为中国人易于接受的传教形式,则将徒劳无功。基于这样的认识,近代西 方来华传教士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发扬了明清之际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士所开创的"学术传教"的传 统,大都致力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活动。于是,借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启蒙教材《三字经》的形式来宣 传基督教的教义,就被他们视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传教方式。从 19 世纪上半叶开始,先后出现了由 传教士编撰的多种版本的《三字经》仿制本,笔者所接触到的主要有:(1)《三字经》,[英]麦都思 (W. H. Medhurst) 编撰,香港英华书院刊印,道光二十三年(1843);(2)《训女三字经》,[英]马典娘 娘(S. Martin)编撰,新加坡刊印,道光十二年(1832);(3)《圣教三字经》,[美]夏察理(C. Hartwell) 编撰,福州太平街福音堂刊印,同治九年(1870);(4)《三字经》,[美]白汉理编撰,京都灯市口美华 书院刊印,光绪元年(1875);(5)《三字经》,编撰者不详,北京华北书会刊印,光绪三十年(1904)。

从现有资料来看,1822年由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巴达维亚编撰刊印的《三字经》为西方来华传 教士最早编撰刊印的《三字经》仿制本之一。 麦都思于 1816 年渡海来华 ,次年抵达马六甲 ,协助马 礼逊、米怜(W. Milne)等人管理印刷所和当地的学校,参与米怜在马六甲华人中组织成立的慈善救 济团体 ——" 呷地中华济困疾会 ",并曾任教于英华书院。1819 年春 ,为了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和传 教范围,他先后在槟榔屿、巴达维亚、新加坡等地传教,1835 年从广州进入中国沿海地区,1843 年到上海定居并开设墨海书馆,成为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编撰的《三字经》1822 年在巴达维亚初版之后,1828 年在该地再版,1832 年在马六甲出了第 3 版,1839 年在新加坡出了小型版,1843 年在香港出了改订版(即上列第一种),1861 年在上海又出了改订版并改名为《真理三字经》「6¹²⁷。这部《三字经》仿制本计 316 句,948 个汉字。首先,它叙述了从上帝耶和华创世、造人,到上帝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的过程。继而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讨论了灵魂与肉体的问题,并详细记叙了上帝派遣"救世主"耶稣降临人世、拯救人类灵魂的事迹以及"末日审判"的有关情况。最后写道:"尔小生,宜求神。神乃好,常施恩。每日早,当祈求。又每晚,不可休。先颂神,罪必认。求恤怜,后蒙恩。正其心,诚其意。止于敬,才成祈。口里话,心要同。此二反,有何用。有恒心,常畏神。至于死,福无尽。"「7」劝诱儿童信仰基督教,成为虔诚的教徒。从上述内容来看,这部《三字经》仿制本主要是一本仿照《三字经》的形式,将《圣经》的基本内容改编后写成的基督教布道书。在鸦片战争前后由西方来华传教士编撰的《三字经》仿制本中,上述类型的仿制本占多数。

例如 .1854 年来华抵上海的美国传教士娄礼华 (R. Lowrie) 曾用宁波和上海方言编撰《三字 经》,后又经同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白汉理改编,先后于 1863 年和 1875 年初版、再版。这部《三字 经》仿制本计 504 句 .1 512 个汉字 .全书分为" 第一章独一神 "、" 第二章人犯罪 "、" 第三章救世主 "、 " 第四章人归主 "、" 第五章论死后 "、" 第六章劝孩童 "等 ,但其基本内容与上述《三字经》完全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 .这部《三字经》常以" 父母 '和" 子女 '相对应的形式来进行说教 .并将儿童视为传教的 主要对象。如第五章中写道:"人为善,升上天。永享福,神面前。人为恶,定罪名。地狱里,永受 刑。儿女歹,父母好。受报应,无颠倒。爹娘恶,必受咒。儿女善,必得救。主审断,世界上。最公 平.无两样。"18]15-16第六章以"劝孩童"为题,仿上述《三字经》的结尾形式并有所发展。内容为:"尔 小孩,嫩心肠。听主道,不可忘。当惧怕,当信爱。当恭敬,当求拜。当受恩,深且重。当感谢,当称 颂。各样罪,当承认。心有恶,当怨恨.....当终身,跟随主。当耐心,受劳苦。临死前,将灵魂。交 耶稣,永收存。死以后,得完全。享永福,神面前。"[8]16-17再如,1870年刊印的美国传教士夏察理编 撰的《圣教三字经》计 320 句 .960 个汉字 .其内容以传布基督教教义为主。该书结尾处写道:"尔小 生,宜寅恭。赖上帝,德至隆。宜祈祷,朝而夕。恒若此,毋休息....心必正,意必诚。祈若此,事以 成。口而诵,心而维。若相反,非所宜。恒厥心,畏上帝。及老死,不可废。"19]13-14可见,上述各种 版本的《三字经》仿制本虽具有基督教布道书的某些共同特征,但西方来华传教士正是鉴于《三字 经》作为中国古代蒙学教材所具有的独特价值,才煞费苦心地将基督教传教的内容与中国传统教材 的形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便将这类改编后的《三字经》仿制本用作教会学校的教材。

就在麦都思于 19 世纪 20 年代在东南亚地区传教的同时,其夫人的妹妹马典娘娘也在这一带开展传教活动,起初即住在麦都思家中,1829 年定居新加坡并在当地的华人学校任教^{[6]40}。由于教学的需要,她编撰了《训女三字经》,并于 1832 年刊印。这部《三字经》仿制本计 404 句,1 212 个汉字。顾名思义,它是一部以女子为主要对象的读物。该书开宗明义地写道:"凡小女,入学堂。每日读,就有用。"[10]1表明其编撰的宗旨及目的之一是劝导女子入学受教。因此,《训女三字经》在编撰时表现出与上述《三字经》仿制本不同的特征。

第一,与上述《三字经》等宗教读本以大量篇幅宣传基督教教义不同,《训女三字经》对上帝创世等内容避而不谈,而是围绕世俗的伦理道德来教导人信神行善。例如文中写道:"人若富,亦敬神。

关于麦都思在东亚和中国的活动可参阅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W. H.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London: John Snow, 35, Paternoster Row, 1840。

其自然,死上天(指人死后升入'天堂'——笔者注)。又人贫,亦爱恶。自然死,入地狱.....小女看, 人烦苦。该可怜,不可笑。见朋友,做恶事。该教之,来做好。女如此,神足爱。"[10]8

第二《训女三字经》较多地借鉴或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遗产及其伦理道德的思想因素。 例如它将《三字经》中的某些文句稍作改动后直接加以引用:"女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 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理。"[10]1 它也宣传中国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并试图将之与西方 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念协调起来。譬如它写道:"在此世,敬畏神。常恳求,其大恩。孝父母,惜兄 弟。若不如,无尽礼。"[10]1"人该随,幼到老。曰仁义,礼智信。其亦教,到无尽。"[10]3

第三、《训女三字经》和中国传统的《三字经》一样具有识字课本的功用、它从女子的衣食住行出 发、涉及待人、接物、处世等诸多方面、因而包含了日常生活的许多常见字、常用字、十分贴近生活、 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就这一点而言,结合当时中国女子绝大部分尚处于文盲失学的状态,《训女 三字经》在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史上的地位也不容忽视。

从总体上看,西方来华传教士编撰的各种《三字经》仿制本是"西学东渐,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它 们通常集基督教布道书与识字课本于一体。由于《三字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 响,特别是作为幼学启蒙教材,曾对教育的普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所以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主观上 寄希望于各种《三字经》仿制本对传播基督教发生同样大的影响。例如,美国来华传教士裨治文 (E. C. Bridgman) 在其主编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上不仅刊登了《三字经》、《幼学诗》、 《孝经》等,而且发表文章从各种视角分析《三字经》的内容,强调其对儿童启蒙教育所具有的重要意 义[11]。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西方传教士在学校使用和推广这些《三字经》的仿制本,使它们作为识 字课本广泛流传,进而传入民间,在客观上对这一时期的教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鸦片战争前后, 西方来华传教士始于东南亚华人聚居的国家和地区开办教会学校、继而进入中国沿海及内地办学。 在此过程中,他们编撰刊印各种版本的《三字经》仿制本,并作为教会学校的教材加以使用。关于这 一点,美国来华传教士卫三畏(S. W. Williams)在其《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Education, Social Life, Arts, Religion,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一书中有过明确的记载。他在论述《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 中国蒙学教材时特别重视《三字经》的教育作用,指出传教士编撰的各种《三字经》仿制本曾广泛而 有效地用作教会学校的教材[12]。

三、太平天国《三字经》仿制本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在面临西方列强武力入侵的同时,又遭到国内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特别 是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引人注目的是,与中国历史上历代农 民起义不同,太平天国受到近代"西学东渐"潮流的影响,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它组织了"拜上帝 会".接受西方基督教思想.坚持"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并利用这些思想和观点来抨击封建 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 ——" 孔孟之道 ",从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此思想背景下 ,太平天国 刊印了卢贤拔编撰的《三字经》仿制本,作为教育儿童及农民群众的启蒙教材。这部《三字经》仿制 本计 352 句,1 056 个汉字,主要内容为宣传基督教教义。如除了介绍上帝创世、造人的故事外,该 书详细叙述了摩西率犹太人逃出埃及、在西奈半岛授"十诫"以及耶稣降临并被钉死于十字架及其 死后复活等事迹。这些内容与上述西方传教士编撰的《三字经》仿制本如出一辙。此外,作为一部 蒙学教材 .它也教导儿童在信仰上帝的基础上懂得做人的道理。例如它写道 :" 小孩子 .拜上帝。守 天条,莫放肆。要炼正,莫歪心。皇上帝,时鉴临。要炼好,莫炼歪。自作孽,祸之阶。慎厥终,唯其 始。差毫厘,失千里。谨其小,慎其微。皇上帝,不可欺。"[13]227 它还对儿童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道德 戒规:"勿奸淫,勿污秽。勿说谎,勿杀害。勿偷窃,勿贪懒。"13227最后告诫儿童:"小孩子,正其身。 正是人、邪是鬼。小孩子,求不愧。帝爱正,最恶邪。小孩子,慎莫差。皇上帝,眼恢恢。欲享福,炼 正来。"[13]227 这些内容与上述西方传教士编撰的《三字经》仿制本也并无二致。因此可以说,太平天 国刊印的《三字经》仿制本与西方传教士编撰的《三字经》仿制本同为"西学东渐"这一大背景下的产 物,以至于有的日本学者将前者与后者一起归类为"基督教传教士版《三字经》",或称前者为"准传 教士版《三字经》"[14]10。

然而,不可否认,较之西方传教士编撰的《三字经》仿制本,太平天国刊印的《三字经》仿制本有 其不同的特点。首先,它试图结合中国的历史来说明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以及基督教的普世性,从而 证明太平天国"拜上帝会"没其政权的合法性。书中写道:"普天下,一上帝。大主宰,无有二。中国 初,帝眷顾。同番国,共条路。盘古下,至三代。敬上帝,书册载。商有汤,周有文。敬上帝,最殷 勤。汤盘铭,日日新。帝命汤,狂其身。文翼翼,昭事帝。人归心,三有二。"[13]226认为中国最初也 是信仰基督教及其上帝的国度。其次,它谴责历代封建帝王昏庸无能,为太平天国革命推翻封建专 制统治提供理论依据。它指出,自秦汉以后,由于历代帝王的提倡和扶持,道教、佛教盛行,致使基 督教及其上帝湮没无闻,及至宋代,国力衰微,外族入侵。书中写道:"至秦政,惑神仙。中魔计,二 千年。汉武宣,皆效尤。狂悖甚,秦政徒。武临老,虽悔悟。少壮时,既错路。汉明愚,迎佛法。立 寺观、大遭劫。至宋徽、犹猖狂。改上帝、称玉帝徽何人、敢乱改。宜宋徽、被金掳。同其子、漠 北朽。自宋徽,到于今。七百年,陷溺深。讲上帝,人不识。阎罗妖,作怪极。"[13]226从而号召人们 起来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温'的理想社会。

太平天国在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同时,极力提倡普及教育。 为此,开设了育才馆、育才 书院等新型教育机构,招收民间儿童及太平天国官兵的子弟入学、给以衣食和教育、并发给上述《三 字经》仿制本等作为启蒙教材。这些青少年学生通过学习《三字经》仿制本,不仅提高了识字水平, 而且增强了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意识。美国传教士呤唎(A.L.Lindley)曾偕其未婚妻和几位友人 参加太平天国有关工作约四年之久,他在其著名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三字经》仿制本在太平天国广 为流传的情况[15]255。

四、医学版《三字经》仿制本

《三字经》编订问世后在民间广泛流传,其影响日益扩大,渐渐深入到学术领域,出现了若干专 题性质的《三字经》仿制本,其中又以医学版《三字经》仿制本备受世人关注。清代名医陈念祖编著 的《医学三字经》堪称代表作。陈念祖,字修园,乾嘉年间人,"他具有较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又在 中医著作方面下过不少由博返约的功夫",在此基础上编成《时方妙用》、《医学从众录》以及《医学三 字经》等医学著作,"在普及中医学方面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16]。《医学三字经》计726句,2178 个字,分为24章,即"医学源流第一"、"中风第二"、"虚劳第三"、"咳嗽第四"、"疟疾第五"、"痢疾第 六"、"心腹痛胸痹第七"、"膈食反胃第八"、"气喘第九"、"血症第十"、"水肿第十一"、"胀满蛊胀第十 二 "、"暑症第十三 "、"泄泻第十四 "、"眩晕第十五 "、"呕吐哕第十六 "、"癫狂痫第十七 "、" 五淋癊闭赤 白浊遗精第十八 "、"疝气第十九 "、" 痰饮第二十 "、" 消渴第二十一 "、" 伤寒瘟疫第二十二 "、" 妇人经 产杂病第二十三"、"小儿病第二十四"。"医学源流第一"章中写道:"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 详。难经出,更洋洋。越汉季,有南阳。六经辩,圣道张。伤寒著,金匮藏。垂方法,立津梁。李唐 后,有千金。外台继,重医林。后作者,渐侵淫。红紫色,郑卫音。迨东垣,重脾胃。温燥行,升清 气。虽未醇,亦足贵。若河间,专主火。遵之经,断自我。一二方,奇而妥。丹溪出,罕与俦。阴宜 补 ,阳勿浮。杂病法 ,四字求。若子和 ,主攻破。中病良 ,勿太过。四大家 ,声名噪。必读书 ,错名

号。明以后,须酌量。详而备,王肯堂。薛氏按,说骑墙。士材说,守其常。景岳书,著新方。石顽 续,温补乡。献可论,合二张。诊脉法,濒湖昂。数子者,各一长。揆诸古,亦荒唐。长沙室,尚彷 徨。唯韵伯,能宪章。徐尤著,本喻昌。大作者,推钱塘。取法上,得慈航。"[16]1-18在这里,《医学三 字经》以简明扼要的文字叙述了中医发展的历史及其源流概貌,强调中国医学有其自身的理论体 系、譬如说《黄帝内经》是中医第一部经典著作、综合地阐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的一般概念和治则治 法: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则具体地总结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各种方法,而后代诸家更是不 断加以发挥和补充,遂为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医学三字经》要求人们系统地学 习和掌握中医的理论和方法,即作者所说的"取法乎上"。在此之后、《医学三字经》针对上述常见病 症,分别从病因、症状、诊断、治疗、护理、预防等几个方面展开了具体的论述。 作为附录部分的"附 方"含药方529则。

考虑到仿《三字经》的形式来论述较为专门的医学知识有着诸多不便之处,陈念祖在撰写《医学 三字经》时采用了加注的方法。如"气喘第九"开宗明义地写道:"喘促证,治分门。卤莽辈,只贞元。 阴霾盛,龙雷奔。'继而在此之后加注道:"气急而上奔,宜分别而治之。贞元饮是治血虚而气无所 附,以此饮济之、缓之。方中以熟地、当归之润,所以济之,甘草之甘,所以缓之。常服调养之剂,非 急救之剂也。今医遇元气欲脱上奔之症,每月此饮以速其危,良可浩叹。喘症多属饮病。饮为阴 邪,非离照当空,群阴焉能退避。若地黄之类,附和其阴,则阴霾冲逆肆空,阴邪滔天莫救,而龙雷之 火,愈因以奔腾矣。"[16]132对正文作了详细的解释,遂开创为《三字经》仿制本加注的先例。

进入近代、编撰医学版《三字经》仿制本的传统仍不绝如缕。著名中医学者胡荫臣在光绪年间 编成《眼科三字经》,作为"定静轩医学四种"之一,由蓝田胡集义堂刊印行世。作为眼科专家,胡荫 臣编撰了若干种中医学的眼科专著,在此基础上又将其要点汇编为《眼科三字经》,用作授徒讲课的 教材。该《三字经》仿制本除" 自序 "外 .正文部分含" 眼科总论 "、" 眼科各论 "、" 外障门症治 "、" 总论 方解"、"各论方解"等章节,附录部分含"蓝田胡氏精制眼科内服神效药七种"、"蓝田胡氏精制眼科 外点神效药七种 '等处方,充分体现出医学版《三字经》仿制本将专业科学知识与《三字经》文字形式 融为一体的特色。

五、传入日本的《三字经》及其仿制本

据现有资料、《三字经》从 17 世纪初江户时代传入日本后,不久便在民间广泛流传。据石川松 太郎编撰的有关文献目录,元禄五年(1692)刊印的《广益书籍目录》中已列有《三字经》和福建陈翰 迅的《三字经注解》[17]47。另据日本学者矶村少苟著《三字经训读及精解》一书,天保二年(1831)德 川幕府官版的《三字经》也已问世[18]3-4。著名史学家大庭修根据《唐船持渡书籍目录》指出,江户时 代中国商人曾一次舶来《三字经》296部[19]114-115。他还论述道:当时《三字经》多半用作培养"唐通 事 '的" 会话最初步教材",所谓" 唐通事 '即汉语的口译者[19]405。

这一时期《三字经》不仅在日本民间流传,而且曾用作蒙学私塾寺子屋的教材。关于这一点, 著名教育史专家乙竹岩造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后认为: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在寺子屋中用《三 字经》作教材的为数可观:其中,或用作"习字教材",或用作"读书教材",而从总体上看,用作后者多 于用作前者 。为了便于儿童阅读和学习、当时日本又出现了一些《三字经》的注释本。例如、天保 十二年(1841)刊印的《余师三字经童子训》附有汉语序文和日文注解。序文中指出:"宋王伯厚(即 王应麟 ——笔者注)《三字经》教童蒙之书也,语约意明,以便初学。而所引颇多典实,自非善读不能 无隔靴搔痒之患也。若此编则国字(指日文 ——笔者注) 训之 .图画形之 .儿女子不识一丁字者 .亦 皆可目而通晓焉。"[20] 书中还印有王应麟教授儿童的插图,以及根据《三字经》内容绘制的若干 插图。

从江户时代至明治初年、伴随着《三字经》的大量输入和广泛流传、在日本又出现了各种版本的 《三字经》仿制本。据日本学者统计,这一时期出现的《三字经》仿制本多达二十余种[21]。按其内 容及用途划分,有的属于历史教材,有的属于识字教材,有的则属于书法教材,还有若干关于这些仿 制本的注释本。其中,属于历史教材的就有《本朝三字经》、《皇朝三字经》、《皇朝新三字经》、《皇国 三字经》、《神代三字经》等多种。这些仿制本均由日本文人用汉语编撰而成,内容大多以介绍日本 的历史地理及名人为主。而出版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仿制本,当推大桥若水编撰的《本朝三 字经》。大桥若水生于下野国枥木町(今枥木市)的一个医师之家。早年他曾赴京都学习医术,也曾 师从日本著名汉学家、史学家赖襄研究汉学,后在家乡开设私塾并行医。

《本朝三字经》初刊于嘉永五年(1852),后多次重刊。全书计 154 句,462 个汉字。开篇处即对 日本所谓大和民族的特点作了概要的介绍:"我日本,一称和。地膏腴,生嘉禾。人勇敢,长干戈。 衣食足,货财多。"2211接着,以历代天皇为线索历述朝代的兴衰嬗变,以此来歌颂天皇的"文治武 功",间或表达对其他历史名人或褒或贬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在叙述这些内容时《本朝三字经》 反映出下列特点:其一.对历代天皇歌功颂德,将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制视为日本国体的精华,表 现出作者具有一种很强的"皇国史观",也反映出幕府末年"尊王攘夷"的思想正方兴未艾。其二,除 了历代天皇及文臣武将这些政治人物而外,作者也歌颂了日本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文人学者。其中, 有留学唐朝,名扬中日两国文化界的阿培仲麻吕(晁衡):有曾师从中国高僧惠果,于佛教、文学、书 法均有很高造诣的弘法大师海空 :也有被尊为" 学问之神 '的著名学者菅原道真 :还有著有长篇小说 《源氏物语》的女文学家紫式部 ,等等 ,这反映出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突破了局限于" 帝王将相 '的封 建史学的传统框架。总之、《本朝三字经》继承发扬了《三字经》的传统,较好地发挥了作为启蒙读物 所应有的特点及功用。日本学者青木可笑曾给予《本朝三字经》高度评价:"凡数千年之事迹,约收 此小册子,所谓不出卷知天下者,非耶?读者勿以浅浅易易忽焉。"[23]

1868 年明治维新后,江户幕府政权被推翻,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开始推行"废藩置县"、 " 殖产兴业 "、" 文明开化 "三大政策 .引导日本迅速走上近代化的改革之路。这一历史巨变及时 反映到了当时出现的《三字经》仿制本的内容之中。例如,明治四年(1871)刊印的《皇朝新三字经》 在沿用以往日本《三字经》仿制本的写作方式来记叙历史的同时,记载并称颂了明治维新的改革。 其中写道:"今上立(指明治天皇主持朝政 ——笔者注),亲东伐。镇江城(指江户东京 ——笔者注), 降奥越。迁皇居,令四达。置郡县,纲一括。十六国,通使节。八十州,开车辙。维新政,无典 缺。庙廊器,皆人杰。"12419-10向这一时期的日本民众和儿童宣传了明治维新所带来的巨大成就及 变化。

明治维新后,日本虽然在文化教育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改革,主要表现在通过建立起 近代三级学校教育体制来导入以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为中心内容的课程设置、教育内容及教学 方法等,但在民间,私塾性质的蒙学教育机构仍然残存,一些旧式的文人学者也继续热衷于教授和 传播中日两国的传统文化及汉学知识。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从幕府末年到明治初期,在士人 家庭中鼓励子女从小背诵《三字经》,这仍被视为有助于儿童教育的一种方式。"[18] 正是在这种历史 背景下,自明治初年起,为了满足青少年学习汉字、书法及历史知识的需要,日本陆续刊印了《本朝 三字经》的 5 种注释本和 4 种习字本:前者为明治四年(1871)刊《本朝三字经余师》、明治五年 (1872)刊富泽当英著《本朝三字经辨》、明治六年(1873)刊青木可笑著《本朝三字经余师略解》、明治 七年(1874)刊石崎谦著《本朝三字经便蒙》、明治十二年(1879)刊大枝美福著《本朝三字经和解》,后

者为明治五年刊柳田正斋书《行草本朝三字经》、明治六年刊伊藤桂州书《真草本朝三字经》、明治十年(1877)刊高斋单山书《本朝三字经》及明治十三年(1880)刊柳田正斋书《本朝三字经》。

明治初期《三字经》仍在日本流传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当时一些著名的儒学家、汉学家曾编撰一批《三字经》仿制本,并在民间广为传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明治六年刊印的《女三字经》。作者东条琴台是江户末期至明治初期日本有名的儒学家、汉学家,也是明治时期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的外祖父。全书计330句,990个汉字,以宣扬"男女有别'的思想、教导女子遵守"三从四德"的封建道德规范为核心内容。它开宗明义地写道:"女子道,在于贞。天常覆,地久载。男女析,夫妇判。参造化,配阴阳。坤元利,鬼神通。夫不刚,无御妇。妇不柔,无事夫……无专制,有三从。自振古,各所记。咸相同,其言曰。女子者,家从父。嫁从夫,老从子。"[25]1-2 接着,它从所谓"四德"讲到"五伦",并讲解了中国古代女子所应遵从的所谓"六顺"、"七教"、"八统"、"九思"、"十礼"等概念;为此,它又引用了中国古代《女戒》、《女孝经》等典籍。该书最后总结道:"女无才,便是德。妇无识,便是才。深切戒,毅然立。谓维全,妇女道。"[25]17 从通篇内容来看,《女三字经》充满了封建伦理道德及传统女子教育观的说教,但据《下田歌子先生传》记载,下田歌子幼年时东条琴台正是以此来教育她的,这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明治初期女子教育及家庭教育的一个侧面。

就文化与教育的关系而言,教育历来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它将文化加以有目的、有意识的传承和嬗递,又通过选择和重组而实现对文化的改造和创新。《三字经》作为中国古代蒙学教材,就充分体现了教育所具有的这种文化功能。18-19世纪,无论是对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文化交流而言,抑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还是在保存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方面,《三字经》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当《三字经》传入日本后,又出现了多种仿制本,对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字经》不但是文化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而且是文化教育交流史上的重要文献。

(本文曾蒙日本立正大学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吉田寅先生热情指教,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 [1] 陆林:《校三字经辑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Lu Lin, Jiao Sanzijing Jikan, Hefei: Anhu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1994.]
- [2] 陶格:《满汉合璧三字经注解》卷上,乾隆六十年京都二槐堂梓行,1795 年。[Tao Ge, Annotations to Sanzijing in Manchu and Chinese Language(), Beijing: Erhuaitang,1795.]
- [3] 崧嚴富俊:《满蒙合璧三字经注解》卷上,道光十二年京都三槐堂书坊刻本,1832年。[Songyan Fujun, Annotations to Sanzijing in Manchu and Mongolian Language(), Beijing:Sanhuaitang,1832.]
- [4]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3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Mao Lirui & Shen Guanqun, A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Vol. 3 Jinan: Shando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7.]
- [5] 韩达:《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第1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Han Da, A History of Education of Chinese Minority Group: Vol. 1, Guangzhou: Guangdo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8.]
- [6] A.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 [7] [英]麦都思:《三字经》,香港:英华书院,1843 年。[W. H. Medhurst, Sanzijing, Hongkong: Anglo-Chinese College,1843.]

关于东条琴台的生平事迹可参阅西尾豐《 琴臺》,(京)堂 店 1918 年版。 有关详情可参阅西尾豐《下田歌子先生傳》,(京)大空社 1989 年影印本。

- [8] [美]白汉理:《三字经》,京都:美华书院,1875年。[H.Blodge,Sanzijing,Beijing:Meihua College,1875.]
- [9] [美]夏察理:《圣教三字经》,福州:福音堂,1870年。[C. Hartwell, Sanzijing of Saint Protestants, Fuzhou: Fuyintang,1870.]
- [10] [英]马典娘娘:《训女三字经》,新加坡,1832年。[S. Martin, Sanzijing for Women, Singapore, 1832.]
- [11] E. C. Bridgman, Santsze King, or Trimetrical Classic, Chinese Repository, No. 4(1835).
- [12] S. W.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Education, Social Life, Arts, Religion,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Vol. 1,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 [13]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上海: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The Society of Chinese History, Material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ries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Vol. 1, Shanghai: Shanghai Shenzhou Guoguangshe, 1952.]
- [14] [日]吉田寅:《中國 の童蒙教育 三字經 の資料的考察》、《立正大學 洋史論集》1994 年第 7 期,第 1 21 页。[Tora Yoshita, A Review of Resources Children's Teaching Material Sanzijing , A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Eastern History by Rissyo University, No. 7(1994), pp. 1 21.]
- [15] [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A. F. Lindley, Ti Ping Tien 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 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 Adventure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7.]
- [16] 方药中:《医学三字经浅说》,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年。[Fang Yaozhong, A Brief Study of Sanzijing on Medicine,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1983.]
- [17] [日]石川鬆太郎:《謙堂文 \ 架藏 ·往來物分類目録並 に解題》第 3 集, 京:謙堂文 \ ,1997 年。[Matutaro Ishikawa, A Collection of Kendo Bunko: A Catalogue and Interpret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Vol. 3, Tokyo: Kendo Bunko,1997.]
- [18] [日]磯村少苟:《三字經訓讀及精解》, 京:黄石洞 院,1935 年。[Syoko Isomura, The Expla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Sanzijing, Tokyo: Kosekido Syoyin,1935.]
- [19] [日]大庭修:《江户 代における中國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舎,1984年。[Osamu ba, A Study on the Acceptance of Chinese Culture During Edo Period, Kyoto:Dohosya,1984.]
- [20] [日]內頻逸人:《餘 三三字經童子訓 ·序》,京:春靜堂,1841 年。[Yituhito Naihin, Sanzijing for Children, Tokyo:Syunseido,1841.]
- [21] [日]片野英一:《 アジアにおける 三字經 の普及 に関する一考察》、《日本の教育史學》2002 年第 45 卷, 第 181 198 页。[Eiichi Katano, A Study on the Spread of Sanzijing in East Asia , Research Bulletin of Japan Society for the Historical Studies of Education, Vol. 45 (2002), pp. 181 198.]
- [22] [日]大 若水:《本朝三字經》,京:牡丹舎,1853年。[Wakamizu Ohashi, Sanzijing of Honcho, Tokyo: Botansya,1853.]
- [23] [日]青木可笑:《本朝三字經余 =略解 ·序》,京:靜觀堂、玉 堂,1873 年。[Okashi Aoki, A Sketchy Interpretation of Sanzijing of Honcho, Tokyo:Seikando and Gyojyundo,1873.]
- [24] [日]佚名:《皇朝新三字經》,京:新刻讀 堂,1871 年。[Anon, New Sanzijing of Kocho, Tokyo: Shinkokudokusyodo,1871.]
- [25] [日] 琴台:《女三字經》,京:求古堂、萬鐘房,1873年。[Kindayi Tojyo,Sanzijing of Women, Tokyo: Kyukodo and Bansyobo,1873.]